

21 世纪中国新发展哲学丛书

21 世纪是全

球公正性凸显的

世纪。公正、正

义主题是当今国

内外人文学界关

注的热点，又是

哲学、经济学、

法理学、政治学

以及伦理学的跨

学科难题，因为

“公正是社会制

度的首要价值，

就像真理是思想

体系的首要价值

一样。”

全球发展的公正性： 问题与解答

21 世纪是全球公正性凸显的世纪。公正、正义主题是当
今国内外人文学界关注的热点，又是哲学、经济学、法理学、
政治学以及伦理学的跨学科难题，因为“公正是社会制度的
首要价值，就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

● 冯颜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1 世纪中国新发展哲学丛书

全球发展的公正性：问题与解答

冯颜利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球发展的公正性：问题与解答/冯颜利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1

ISBN 978 - 7 - 5004 - 5844 - 4

(21 世纪中国新发展哲学丛书)

I. 全... II. 冯... III. 社会发展—研究—世界
IV. D5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17335 号

策划编辑 卢小生 (E-mail: georgelu@vip.sina.com/georgelu99@yaboo.cn)

责任编辑 黄德志

责任校对 张报婕

封面设计 解 佳

技术编辑 李 建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0 (邮购)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新魏印刷厂

装 订 丰华装订厂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数 1—6000 册

印 张 17.75

字 数 286 千字

定 价 3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21 世纪中国新发展哲学丛书》编委会名单

主 编	任 平		
成 员	任 平	王金福	李兰芬
	夏东民	姜建成	陆树程
	陈 忠	冯颜利	庄友刚

走向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建构

(代序言)

任 平

《21 世纪中国新发展哲学丛书》是关于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创造性研究成果的集中展示。这些成果都是由我领衔的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士点学科多年来深入研究的思想产物。20 多年前，法国著名发展哲学家弗朗索瓦·佩鲁在《新发展观》一书中就追问：什么是发展？什么是哲学？两者是如何关联的？“佩鲁问题”是一个时代对哲学的叩问。任何哲学总是时代问题的解答方式。发展哲学是发展实践、发展问题的哲学反思，是对发展目标与发展进程的人文关怀，是发展观深层的逻辑构架和理性表达。发展哲学的创新演变展示着发展观念的与时俱进。21 世纪是全球与中国大发展的时代，也必然是发展哲学嬗变与创新的时代。作为真正的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的活的灵魂，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大力倡导“科学发展观”，深度反思发展问题、创新发展理念、转变发展方式，走向当代中国的发展哲学建构。发展哲学的创新需要确定自己的理论坐标。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当代议程，中国的发展哲学以“一体两翼”的路径布展创新格局，既需要在对接当年马克思关于发展与资本现代性批判的思想传统，返本开新地“接着讲”；也需要在与全球发展理论积极的对话中实现发展哲学的本土化转换；更需要在对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解答中，对“中国经验”、“北京共识”的哲学反思中提升为中国独创和特色鲜明的发展哲学。

一、资本现代性批判：马克思思想的出场路径

在利益结构和思想文化同样多元、多样、多变的社会差序格局中构建

中国的发展哲学，需要以时代视域总结马克思的思想遗产，在重新理解中激活思想精神，这是我们推进发展哲学创新的基本路径之一。发展哲学研究从来就不是“价值悬搁”或价值中立的。在巨大的言说空间中存在着“众声喧哗”，因此，表明我们的理论立场和文化身份，突出主导的话语旨趣是十分必要的。此外，近年来，严格意义上的“发展哲学”研究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历史观和辩证法传统相互脱节，也就是说，当代中国发展哲学建构缺失马克思的思想资源的支撑，因而需要我们廓清马克思主义地平线，通过从当年马克思到当代马克思主义这一历时态的两端语境出发加以反思而对接。为此，我们首先要打开马克思的思想资源，“回到马克思”的“原初语境”，深度考察当年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现代性路径及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视域，才能“接着讲”以返本开新。

马克思的发展话语主要就是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在建构中国现代性的语境中打开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重大理论价值和时代意义，首先基于一个全球化时代的挑战。全球化是“流动的现代性”，它在不断地扩张西方话语霸权的同时，不断地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因而使正在探索“多元现代性”，特别是异于西方模式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性发展事业面临源头失语的威胁。其次，在当代中国，现代化是发展的目标，也是马克思主义在当代中国的出场路径，更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主旨。当代中国不仅在技术层面上，而且在理论层面上追问现代性发展的内涵，从而不断地召唤马克思现代性话语的出场。再次，全球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分析，德里达、詹姆逊、德里克等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对当年马克思后现代思想遗产的“重新发现”，拉克劳和墨菲等人的后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现代性思想的否弃，以及哈贝马斯、吉登斯、贝克、鲍曼等人对现代性的“反思”，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就是如何在科学考察马克思与现代性、后现代的关系中准确地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基点和本真意义，这需要我们认真地加以反思。

然而，长期以来，马克思的资本现代性批判视域处于历史的缺场状态。因为它曾经遭遇三次重大的历史遮蔽。

第一次：马克思·韦伯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原创地位的遮蔽。

多年来，学界几乎以“集体无意识”方式将现代性思想的原创地位不是给予卡尔·马克思，而是给予马克思·韦伯，从而在现代性话语领域内造成马克思原创地位的缺失。应当指出：“两个马克思”（卡尔·马克

思与马克思〔斯〕·韦伯）并不完全断裂和对立。他们的现代性话语具有同源性。马克斯·韦伯与马克思都是启蒙思想、古典经济学（包括李斯特的国民经济学）、法国社会学和德国哲学中现代性思想的继承者，都相信历史的进化和发展，都要求描述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他们都重视对社会结构和转变动力的考察。所不同的是，对社会变革的基础、根据和进路的解释。他们关于现代性话语的对立，主要是解释框架的对立、理论范式的对立、立场和方法论的对立。这些对立的结果，导致马克思现代性视域原创地位在西方话语世界中的消解。

在马克思的笔下，“现代社会”与“现代工业”、“现代社会主义”、“现代无产阶级”、“现代生产力”等是其出场的历史语境——资本全球化的“现代社会”使然。资本全球化正是马克思批判性反思的主要“现代社会”，那么，正是在这一批判反思中马克思得出了关于现代性的深刻理解，使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出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对以大工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资本全球化扩张所带来的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变的精彩描述，《雇佣劳动与资本》和《资本论》中对资本全球化的批判性考察，都是马克思关于现代性文本中的经典之作。马克思也因此跻身于现代性与全球发展理论家的行列^①。

与马克思的“病理学”批判考察的立场不同，以研究资本社会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为主要目标的思想家——韦伯是从“生理学”角度——维护资本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秩序角度切入现代性问题域的。由这一目标所限定，韦伯现代性眼界的上限是永恒合理的资本社会，而下限是即将被否定的传统社会。因此，构造现代性理论的基本框架：“传统—现代化”，同时构造出关于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机理。正是在这一点上，韦伯的现代性话语有三点思量：其一，必须与马克思批判性分析框架相对立，从而全面覆盖马克思话语；其二，必须能够说明转变的机制；其三，必须能够说明资本社会是现代性的典范，是具有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社会。

因此，韦伯的“文化学”分析框架正好将马克思的历史观架构做了颠倒：按照马克思的框架应当是最表层、最后被决定的因素——意识形态或文化—价值观念，被韦伯置于分析框架最内在、核心的部位。制度层面

① 参见拙著《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第1章，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作为价值观念的第一表象，处于框架的中间；而马克思认为是最基础的、起决定性作用的物质层面，被安置在最表象、最后被决定的部位。价值观念—行为—制度—物质器具，依此演绎的分析逻辑成为他解释现代化的基本理论架构。在他一生的众多著述中，《经济与社会》阐述了现代性的核心——合理性和合法性问题。一个合理性的社会，作为良性社会的最高标准和最高评价，也是现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核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阐述资本主义精神人格与文化人格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关键性意义；《儒教与道教》集中阐述了东方传统社会——主要是中国与印度社会难以产生资本主义的文化原因，提出了“韦伯原理”；等等。合理性主导的价值观念、法制社会或官僚制（科层制）社会，“精密机器”的社会理想由此而来。韦伯建立了分析现代性的理论框架，成为第一次全面遮蔽马克思现代性话语原创地位的思想家。此后，他被整个西方社会尊为现代性理论的开山鼻祖，凡现代性之言必出自韦伯。

第二次：依附论与现代化理论的冲突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双重遮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批西方发展学者与“新马克思主义”和左翼学者围绕现代化理论展开大论战。众所周知，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战后获得独立。但是，国家的经济文化异常落后，需要快速发展。但是，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他们毫无例外地面临处于冷战状态的东西方两种意识形态的角逐。西方国家学者为了抵御东方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引领，按照自己的早期发展模式，以韦伯现代性理论为主臬，勾画出发展中国家的西方现代化发展理论。这一理论的初衷就具有明显的抵御马克思主义的西方意识形态向度。如罗斯托《经济增长论》一书的副标题，就直书“非共产党宣言”；英格尔斯的“现代人”标准，就具有明显的“伪装的西方人”色彩。他们主张的现代性，无例外地是自韦伯以来西方模式的现代性；他们推崇现代性社会，无疑都是西方资本化社会，具有明确的反马克思主义倾向。反之，一批拉美国家的新马克思主义者和左派学者，如阿明、普雷维什、弗兰克、多斯桑多斯及沃勒斯坦等人，以马克思的后资本主义思想，特别是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为依据，对以西方模式为蓝本的现代化理论和全球化理论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针锋相对地提出了“依附论”和“世界体系论”。认为国家落后的主要根源不是什么“传统状态”，而是受西方的剥削，对其依附。只有真正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

发展经济，才能够获得发展，而绝不能靠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依靠恩赐。从而导致了马克思主义与现代性话语之间第二次冲突。“依附论”与现代化论成为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的代表。显然，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遭遇双重遮蔽：西方发展理论阻断马克思与现代性的关联，将现代性意识自由主义化，从右的方面覆盖马克思；依附论则以新马克思主义的名义将现代性排斥在马克思主义之外，从“左”的方面否认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冲突双方再一次使马克思关于发展与现代性视域边缘化，客观上阻截了后发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模式的探索。

第三次：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批判，对马克思哲学视域的重新解释，从而造成现代性话语的当代退场，后现代话语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当代遮蔽。

丹尼尔·贝尔、福柯、德里达、哈桑、利奥塔等一批被称为后现代思想家对现代性危机的深刻揭露和批判，逼迫包括马克思现代性话语在内的所有现代性话语的当代退场。与此同时，以后现代视域重新解读马克思，发现马克思“后现代”本性，继承所谓马克思“后现代遗产”，构筑一个后现代马克思形象，这成为从德里达、詹姆逊、齐泽克、德里克、鲍德里亚等所谓后现代马克思主义到拉克劳、墨菲的后马克思主义的共同旨趣。其后果，就是以后现代话语造成了对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当代遮蔽。

对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的三次历史遮蔽，即便没有完全遮没，也使得马克思与现代性关系在当代变成碎片化、零散化、边缘化。在这一领域，人们很难将马克思的新世界观视为现代性视域的一种原创性变革，而是将其地位边缘化；很难将马克思的哲学与现代性视域整体地关联，内在地贯通，科学地把握，而是满足于寻找只言片语和个别观点；很难在中国现代化实践中去寻找马克思的发展与现代性视域作为主要思想资源或者行动指南，而是造成双向脱节，被称为一个马克思哲学与现代性发展之间“脱节的时代”。这既内在地堵塞了作为“时代精神精华”和“文明活的灵魂”的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出场路径，从而必然在实践上也最终在理论上扼杀马克思主义的内在生命活力；同时，也在现代性实践指导上丧失马克思主义话语权，最终使中国现代化建设误入歧途。

因此，我们需要去蔽返本，发现并激活长期沉寂的马克思现代性思想资源。一个基本事实是：以资本全球化为标志的现代社会就是马克思历史地平线，而马克思的新世界观就是现代性社会的哲学地平线。现代性是贯

穿于马克思哲学革命的核心、基础和一以贯之的主线。

重读《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我们可以发现：对资本现代性社会的深刻剖析和批判是造就马克思哲学革命出场的历史语境；反之，哲学革命是造就马克思新的现代性视域真正的理论起点。

当年马克思哲学革命发生有两大基本语境：其一，现实历史语境。马克思生活在一个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进程的开端，英法等国家的资本现代性快速推进国家与德国等停滞国家形成强烈序差，这成为马克思思想出场和发动哲学革命的历史语境。作为一个关注现实而又自觉置身于改变世界的重大历史行动序列中的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这一“世界历史性”的序差事实具有深刻的敏感性；对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本质的追问和批判，成为推动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基本动力。其二，精神语境。马克思发动“哲学”革命的重要原因决定于当时德国的特点。在马克思看来，资本现代性是一个“世界历史性”进程。然而，欧洲各国由于各自的特点，在这一进程中的地位和表现方式各不相同。在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中落后的德国，弱于现代性的实践而长于思辨，经济政治变革落后的国家却在文化上拉起第一小提琴。宗教改革，特别是哲学革命超越现实的困境而指向未来，就成为伴随英法现代性实践进程的主要方式。这成为两条并行线：在英法超越传统的现代性历史实践，在德国就成为精神的自我变革和自我超越：宗教改革以及哲学的反思与批判。哲学成为世界现代性历史进程的精神表现。德国越追随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就越需要在精神上超越可怜的现实状况和精神状况，因而就越需要成为批判的和超越的。哲学革命充当政治变革的先导。“我们是当代的哲学同时代人，而不是当代的历史同时代人。……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① 哲学因批判而成为现代性的，现代性因哲学批判而进入德国。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因此而成为德国走入现代性的标志，也因此成为德国特产，进而成为马克思思想的出场之所以选择哲学革命这一独特路径的精神语境。

两大语境之间构成了一个内在互动的结构，而马克思思想就出场于互动结构的交叉点上。资本现代性与世界历史性进程的序差，成为推动和打开马克思哲学革命进程的历史基础和历史钥匙；而马克思的哲学革命则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7页。

为我们理解和打开马克思对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进程批判的哲学视域和哲学钥匙。围绕“资本现代性”主题而展开的历史批判与哲学革命的互动，成为推动马克思思想出场、产生《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文本、实现哲学革命的基本因素；因而也在语境上决定了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哲学批判路径和哲学革命的形态。

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与哲学批判都随着两者相互作用的向前运动而呈现不同的阶段。学界总是看到交叉点一边的哲学批判序列，而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考察交叉点另一边的现代性视域的变革序列，更缺乏将构成互动交叉点的两边做关联性的考察，将哲学批判和哲学革命看做是马克思为解决资本现代性批判这一历史语境问题的必然结果。其实，马克思哲学批判从一开始就不是孤立的哲学行动，而是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的哲学表现。如何深刻而科学地理解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进程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变革之间的关系，成为马克思面临的主要问题。在为 1848 年欧洲革命（资本现代性革命）而准备的年代，使这一关系更加尖锐化和凸显化。

——批判神圣：马克思初始现代性视域。对相对落后的德国而言，植根于启蒙运动的资本现代性进程是一种革命的、先进的历史运动，如何将这一运动尽快引入德国、改造德国，使德意志民族尽快跻身于资本现代性民族行列，就成为马克思及同时代人的主要任务。而德国在实践上的弱势，迫使德意志更倾向于意识形态变革，旨在尽快融入启蒙现代性视域，以一个新的思想平台锻造成“批判的武器”，对德国现实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为此，一个必要的历史前提是：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对资本现代性启蒙原则是自觉肯定而不是批判，将启蒙以来的资本现代性进程看做是一个必然的、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一种普世的“世界历史性”进程，并以此为基准，转换为思想的“历史偏见”，成为分析一切、批判一切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一种普遍的启蒙现代性范式。这构成了马克思现代性视域的初始向度。与所有启蒙行动一样，德国启蒙也是在对中世纪传统神学的批判起步的。与所有启蒙行动不同的是，德国宗教改革与哲学革命是现代性的主要路径甚至是唯一路径。马克思与德国同时代思想家一样，都是基于启蒙现代性初始框架、起始于宗教改革、宗教批判。马克思的初始现代性视域的知识来源是多样化的，其中深受路德教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和法国百科全书派的影响。但作为一个德国人，马克思初始现代性视域主要来源于德国的启蒙现代性思想，其中主要来自路德的宗教改

革和德国古典哲学。马克思自幼就深受父亲改换宗教信仰的影响，中学时代，马克思与同龄人一样，接受“解放的神学”——路德教的熏陶。路德的宗教改革是造就德国现代性文化的一个重要起点。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序言》中曾经这样高度评价：“路德战胜了虔诚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① 路德最重要的贡献在于恢复了作为自主信仰的大写的人的权威，摒弃外在强加于人的神圣；最主要的缺陷也在于：他依然以神圣的信仰而不是理性充塞人的本性和心灵。

——“世界的哲学化”与“哲学的世界化”：马克思改变德国现实的现代性哲学视域。大学期间，马克思扎进黑格尔哲学，以强烈的“自我意识”开始对宗教神学的批判。启蒙运动以来，西方现代性无论具有怎样宏伟的经济结构、制度结构和社会结构，但归根到底都奠定在两大基石之上：以大写的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对神的统治的颠覆，以及以大写理性为核心对传统蒙昧的批判。大写的人与大写的理性，成为马克思的“初始现代性视域”本性和基础；以这一尺度对传统的批判，首先源于对传统神学的批判。在钻进黑格尔这口哲学深井之后，马克思开始建立自己的启蒙现代性批判的思想框架。崇尚大写主体和大写理性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是德国现代性思想的主要形态。从大学到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作为青年黑格尔派一员，不断地将资本现代性世界历史进程上升为一种“自我意识”和理性化的哲学，借以反对神、反对宗教，就表现为“世界的哲学化”，而以启蒙现代性思想为本性的黑格尔哲学在德国的实现，就是“哲学的世界化”。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借助于一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偶尔偏斜”，对黑格尔哲学中反复强调的主题——“自我意识”即大写的主体做了深刻的弘扬。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还借普罗米修斯这一从天国盗火于人间的现代性象征之口说出反神宣言：“说实话，我痛恨所有的神灵！”在大写的人（自我意识）与实体、理性与宗教之间，马克思选择了主体，选择了无神论，同时选择了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页。

性。担任《莱茵报》主编时期，马克思主张“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文明活的灵魂”、“哲学的世界化、世界的哲学化”，是黑格尔“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的现代性注解。而康德肇始对人的主体性的弘扬，在马克思那里表现为一种批判的关于人的解放学说。

——人本学：马克思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域。如果说青年黑格尔给予马克思反宗教神学的第一个现代性批判武器，那么，费尔巴哈则是一个更为彻底和激烈地反神学、反隐蔽神学——黑格尔哲学的现代性思想家，正是他给予马克思以启蒙以来现代性所能走到的最高处，达到经典现代性所能够达到的最高水平。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的哲学信仰的转变，不仅仅是马克思现代性批判对象的转变——从对宗教的哲学批判，到对哲学自身的哲学批判；而且是“批判武器”即现代性视域的转变。其个中原因，固然有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所指认的“反对神学”的斗争与黑格尔隐蔽神学前提之间的矛盾的推动，导致一大批彻底反宗教的哲学青年走向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但是，根本原因还在于：宗教起源于世俗社会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异化。在哲学批判宗教这一世俗异化结果形态之后，需要反思这一异化的根源即德国世俗社会本身。这也正是现代性的世俗化、走向人的感性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必然要求。从针对宗教的哲学批判，进入到针对哲学的哲学批判，同时也是针对德国历史本身——政治批判：“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之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德国的传统社会状况无情的批判路径选择了德国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这是一个政治学领域。马克思为什么从德国的法哲学批判入手？因为在马克思看来，“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②。而政治领域历来是现代性制度维度所要变革的主要领域，马克思一再提到“现代的政治社会现实”、“现代主要问题”、“德国式的现代问题”。但是，针对制度的哲学批判不同于政治学批判，它需要回归现代性基础和本性。马克思批判德国制度、推动德国政治变革的一个根本理论框架，来自

① 同上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页。

② 同上书，第7页。

于费尔巴哈哲学。马克思高度赞扬费尔巴哈以两大基石来重新奠定现代性批判的理论框架：其一是人本学。以抽象普遍的类为本性的、大写的人为基础，这将启蒙以来现代性的第一原则发挥到最高水平：“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这就是费尔巴哈的抽象的人本学原则。马克思以人本学原则批判德国，以人本学标准来衡量德国的落后状况，认为德国低于历史水平和“现代政治水平”。德国革命，就是“要达到的人的高度的革命”^①。“德国唯一实际可能的解放是以宣布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个理论为立足点的解放。”^②人本、异化、异化扬弃和人性复归等框架性话语构成了马克思的现代性视域的基本框架。其二是感性直观。费尔巴哈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理性虚假性的批判导致他诉诸感性直观。马克思接受了“感性”这一向度，“感性的外部世界”、“感性对象”等词语成为马克思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到《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主要术语。但是，并没有改变现代性的理性假说。

——国民经济学批判：马克思经济学—哲学批判的现代性视域。《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展开国民经济学批判的标志。马克思在批判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之后，为什么要批判地反思德国的国民经济学？

起因之一，黑格尔哲学理性与德国现代性实践的矛盾。在《莱茵报》任主编期间，马克思在为“林木盗窃案”和“摩苏尔农民问题”辩护过程中就痛苦地发现：对于黑格尔哲学理性支配的、被称为“地上的神物”的普鲁士国家并没有按照“哲学世界化”精神显现为一种维护公众利益的普遍理性，而是一种维护私有财产的非理性。这一本性的异化，既不能从国家观念中寻找，也不能从国家本身去寻找，而要从产生国家的市民社会、从经济学去寻找。国家的异化只能是市民社会的自我分裂。因此，在对德国政治哲学和国家哲学批判之后，必须深入到国民经济学批判中去寻找这一异化根源，而只有消除异化的经济学根源，才能最后恢复现代性的理性。为深度探索历史之谜，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同时还对法国国民公会（市民社会）历史做了初步考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9页。

② 同上书，第16页。

起因之二，依然是德国现代性与英法的历史序差。马克思这样来提出问题：“在英国和法国，问题是政治经济学或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德国，问题却是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① 马克思区分“政治经济学”和“国民经济学”两者，旨在进一步解开德国非现代性的结。一个有趣的事实是：长期以来，学界根本忽略或者有意混淆一个事实的界线：马克思此处着眼于“国民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后来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认为，“国民经济学或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是德国低于现代化历史水平的独特羁绊，因此，必须要加以批判。更为有趣的是，恩格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在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下也变成《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所以，马克思思想出场的初始路径不是《资本论》时期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前者是针对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后者恰好是针对低于现代性的德国批判。此时，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意识到：国民经济学不过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德国体系，或者说，是资本现代性意识形态的变种。私有财产不仅是国民经济学，也是政治经济学的前提。对这一体系的批判要解决的是前提性批判。马克思认为，“人的根本在于人本身”，在费尔巴哈的人本学现代性最高点上批判国民经济学，力图去寻找一个人本学异化的逻辑，在这一意义上，在总问题的设计和解答思路，马克思依然没有超出费尔巴哈提出的经典现代性的最根本的前提，没有对前提加以反思、批判和怀疑。

起因之三，马克思批判地考察国民经济学，是要寻找以无产阶级为代表的劳动解放的现代性道路。私有财产对国民的统治、对人的统治“造就”了无产阶级，造就了人的非人性。“国民经济学从私有财产的事实出发。它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个事实。”“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但是，我们并没有触及到这一国民经济学的前提。在他看来，经济人假设，即“贪欲以及贪欲者之间的战争即竞争，是国民经济学家所推动的仅有的车轮。”^② 马克思撇开国民经济学的语言，直接从事实出发，然后加以哲学批判。马克思发现，一个基本事实是：劳动是人的类本质；而在国民经济学中，私有财产却是劳动、商品、货币和资本的异化，整个社会关系的异化，人的全面异化。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页。

^② 同上书，第40页。

再次引导马克思走向人本学辩证法：以大写的人的本质为起点，认为国民经济学实现了对国民（人）的统治，因此需要从大写的人出发，对国民经济学的哲学基础和前提进行批判。批判的最高原则，就是大写的人。人的异化及其扬弃，则成为马克思批判国民经济学对国民统治的基本视域。马克思借助于思想的框架，是“实践的”异化手段——异化劳动。一方面，将经典现代性的批判性框架发挥到极端，达到对人本学的思考、对人的本质的思考；另一方面，又将这一本质思考为实践的，但是这一本质不是造就人的本质的，相反，却是人的不变的先天本质，是属于人、属于人的类属性的。人的本质不是由实践造就的、后天的，而就是在逻辑上被先天地规定的，也是在后天被异化的，更在扬弃异化、恢复类本质中重新被建构的。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只是德国的国民经济学独特本性和独特羁绊，扬弃异化，达到人对人的类本质真正占有和复归就是德国朝向人类解放的共产主义，同时是现代性社会——真正属于人的社会。但是，实际上，在这里，马克思展开的不仅是针对国民经济学的批判，而且是针对整个资本现代性的批判；不仅是对作为德国国家异化本性的市民社会自我异化、自我分裂的经济学哲学考察，而是对所有资本现代性自我异化和自我分裂的考察；马克思发现的不仅是作为现代性根基的人本学与德国国民经济学之间的矛盾，而且是与所有资本现代性的矛盾。

从人本学视域批判资本现代性，而从市民社会中抽象出来的人的类本质又成为现代性的出发点和归属点，这一矛盾是哲学基础与现代性结果的矛盾，是从同源性基础出发对结果的批判。矛盾的张力来源于如前所说的两大语境的交叉，并将这一交叉矛盾推进到极端。

马克思突然发现：如果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自我意识作为大写人的理性是精神性的、唯心主义的，那么，费尔巴哈式的唯物主义的经典现代性的唯物主义版本、感性的人和感性的自然、感性的外部世界等这些走向生活世界、走向世俗化的话语都在指向一个根本性的世界：资本的现代性社会。其实，所谓大写的人，抽象的人本学原则就是资本的人格化；生活世界不过是资本化社会的消费世界；一切费尔巴哈用抽象哲学话语所崇尚的现代性，都在资本现代性社会中得到了根本性体现。

现代性问题解决了吗？没有。在资本现代性社会理论框架中，马克思用来批判可怜的德国状况的时候，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一框架的基础性缺陷。诉诸无产阶级和未来共产主义的政治要求，与一种人本学框架结合起

来，并没有超出当时资本现代性意识形态。抽象的人本学对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批判，对德国的国民经济学批判，都是在经典现代性基础上，以及费尔巴哈的人本学平台上加以分析和批判的。但是，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说的：“我们将所有世界历史归结为人类劳动，这将有什么意义？”

这意义就是将费尔巴哈所代表的经典现代性的大写的人的原理彻底贯穿到国民经济学批判、法哲学批判和国家哲学批判之中。但是，同时就存在着问题：人本学这一经典现代性的前提却是无批判的。批判的武器本身出现了根本性的问题。这就是马克思在探索现代性道路上面临的根本性困境。抽象的人本学原则与感性实践对人的现实性决定之间存在着无法弥合的矛盾。无声的内在的类聚合并不能保证人的现实本性。因此，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才有了这一革命性的翻转的结论。

对现代性基础的批判，成为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出场路径。马克思对旧形而上学的深刻变革和新哲学世界观的出场原因可能是多样化的，但其中最重要的，不能不是对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资本现代性的批判。在工人运动的推动下，马克思的立场发生了变化，批判国民经济学所主张的资本现代性的现实，但是，批判的武器、理论原则和解释纲领却是资本现代性的原则：人本学。马克思对自己资本现代性批判的前提具有深刻的反思性和领悟性。对资本现代性批判是通过国民经济学批判来切入的，但是，国民经济学批判并没有使马克思得出他要的结论。相反，却使马克思得出了一个类本质话语——经典现代性的根本性话语。批判国民经济学对国民统治，到头来不过是对抽象的人本学的肯定，将一种原来就是虚幻的前提当做是历史的永恒前提。通过哲学批判而达到的人本学视域与国民经济学的资本现代性之间发生矛盾，产生对立的两极：人本的哲学现代性原则与丑陋的资本现代性现实，现代性批判武器与批判对象。既然可以把一切世界历史归结为人类抽象劳动，那么，马克思给自己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真实地、现实地批判资本现代性社会而不是像黑格尔那样的虚假哲学批判？站在启蒙现代性以来的最高成果——人本学基础上，以此作为批判武器，能够彻底地揭示和实际改变资本现代性的现存世界吗？显然不能。不在哲学上批判启蒙现代性两大根基：大写的人以及抽象理性，就不可能彻底地批判和改变资本现代性的世界历史。

对启蒙现代性以来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在批判费尔巴哈